

于成龙的六条戒律

文 生

于成龙《示亲民官自省六戒》写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抵任两江总督后，收录在《于清端公政书》卷七，这是他一生勤政爱民、廉洁从政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多年治理地方的心得体会，尤其是在两江总督任内的施政准则。于成龙自己对“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惩收、崇节俭”六条戒律，更是早晚对照、自我检视。

勤抚恤。于成龙主张官员要勤政爱民、体恤民间疾苦，安抚关心百姓的生产生活，把百姓的饮食寒暖以及礼乐教化时时放在心上。这种爱民之心要真诚无伪，即使力不从心，事有掣肘，但只要有这颗真心在，一点一滴的作为，也能化为百姓的福气。他指出，很多官员没有爱民真心，只是随便挑几件“政绩工程”做一做，就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是好官，这就叫做“市名”，其实还是有残忍害民之心的。

慎刑法。于成龙说，草木禽兽都有生命，不能随意杀伐，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呢？老百姓不幸而涉入词讼，又不幸而在词讼中受刑杖，即使是十分可恶，不能宽恕，也应该在其中寻求一丁点能宽恕的理由，板子打得稍微轻一点、少一点。他还说，监狱其实是造福之地，官员们对囚犯稍微仁慈一点，就有自己的福报。如果任意关押、任意加

刑，甚至为了情面和贿赂，把敲打百姓当成发财的手段，那近则自身，远则儿孙，必遭奇祸。

绝贿赂。于成龙说，因为家贫而出来做官，赚几个养家糊口的俸禄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俸禄之外就不应该再有别的收入。他引用俗语说：“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如果当官的沦落到和百姓们谈钱，那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呢？拿人家的钱不给人家办事，鬼神会愤怒斥责，罚你来世变成犬马还债；拿人家的钱替人家枉法办事，朝廷法律森严，一朝犯案，连累全家老小受苦。半夜里回想这种事，能不浑身汗流吗？

杜私派。这个问题，于成龙在罗城时已经讨论过，有时难免要私派，那是因为罗城太穷，官府没有多余的钱办事。两江就不同了，比较富裕，官府里是有一些存银的。他说，老百姓缴纳征赋都很困难，私派的钱粮从哪里出呢？但近年两江军需繁重，不得已暂时私派了很多项目。事后，朝廷允许报销，又把这些钱认真发还给了百姓。但百姓们当初借高利贷，利滚利已经翻了好几番，发还这点钱又有什么意义呢？中间手续复杂，胥吏们还有作弊的可能。官员们当初为什么不从正项钱粮之中，稍作挪借，现价现买，然后迅速报销，这不是省了

许多事吗？为什么非要摊派给百姓呢？古人说：“于不得已处求一份担当，即人民利益处也！”至于那些故意多加私派、从中牟利的官员，那肯定是有恶报后祸的，不可不戒啊！

严征收。这条还是讲征收赋税时严禁“火耗”加征等弊端的。于成龙引用古人语：“钱粮一节，若肯请减，其善无量。”现在不能请减钱粮，但去掉其中加增的弊端，与减钱粮的功德是差不多的。如果一味榨取民脂民膏，满载还家，日后一定生出流荡子孙，耗散你的钱财。

崇节俭。这条是讲禁止奢靡，于成龙说：“长吏近民，虽自己足食，尤当思民之无食者；自己披衣，亦当思民之无衣者。推此一心，纵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又欲起侈丽之想乎？”还引用宋代郑侠的话说：“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何异！”于成龙终身布衣蔬食，反对奢靡浪费，被百姓称为“于青菜”。

于成龙这篇文章，将他自己的平生心事和盘托出。他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样做官的。

于成龙是一名封建时代的官员，其思想有时代局限性，比如相信因果报应等，但其爱民勤政、廉洁奉公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祁县温曲武秧歌

杨 莘

祁太秧歌是我省民间戏曲的典型代表之一，以优美的曲调和丰富的表演，表现真实的生活，而祁县温曲武秧歌是在祁太秧歌向戏剧化发展中派生出来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小花。它既不属于梆子戏，也不像秧歌剧，而是祁太秧歌和武术有机结合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主要表演手段是武打。其剧目大多是取材于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武戏，由艺人自编自演，着力歌颂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

温曲村地处祁县腹地，距县城5公里，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清嘉庆年间，温曲村有一名叫贺大壮的财主，在河南经商时从少林寺中学会一套舞剑、盘刀等武术。回家后，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谋取功名，特地购买武器，在家中开设剑弓房，开辟练武场，让子孙每日晨练武、晚习文，整日研究武术。为了锻炼武术的临阵应用，他们常常以梁山英雄为楷模，虚拟各种阵势，使用各种兵器练习对打。因而，在练武场上就出现了《水浒传》中某些描写武打的情节、场面，甚至在武打中出现了不同性格的角色。为了渲染激烈紧张的厮杀气氛，便加进了晋剧武打的锣鼓经。后来还觉得气势不足，就按照古代武士的形象进行了化妆，还雇用民间艺人，自制武士服装，穿戴起来进行表演，在表演中出现了一些简单的戏剧情节。

起初，他们并不登台演出，只是在逢年过节时邀请良师益友，到家里观看武功表演，求得指点。以后，为了显示他一家的文武成就，便在逢年过节用闹社火的形式，走街串巷进行表演。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剧目是《吃瓜》。它的特点是，全剧没一句唱腔，都是武打加叙述情节的道白。这是武秧歌的初级阶段。

随着练武套数的进一步发展，情节逐渐戏剧化，表演需要大量的演员，光贺家一户人手不足了，从此将本村郭、吕二姓逐步扩充进来。人员壮大，表演深化，这种武打表演便向表达人物性格、感情方面发展。他们采用祁太秧歌的民间曲调，安排了少许唱词，有了故事情节，有了角色行当，又有说、有唱，于是就搬上了简陋的舞台进行表演。这就脱离了贺家原来练武求功名的宗旨，走上了健身、娱乐的道路。这时，由贺大壮的后裔贺庆年担任班主，在村上自行组织了“同乐社”，开始了有组织的演出活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剧目是《翠云楼》。其中有一场叫《大观灯》，能单独上演，一直流传到现在。

武秧歌的主要代表剧目有：《翠屏山》《武松打虎》《吃瓜》《卖艺》《翠云楼》《神州会》《吴天关》《木兰从军》等。

温曲武秧歌除了以武打为主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表演武打时，实打实，不采用戏曲武打中虚拟的程式套子，只有经过严格武术训练的人，才能登台表演。



武秧歌《翠云楼》剧照（资料图片）

2.武打道具全部是真刀真枪，不使用戏曲中制作的道具。

3.有的剧目全剧没有一句唱腔，全部是念白。有的剧目有时出现少量的唱腔，也是采用柳调以及祁太秧歌的曲调稍加改革进行演唱的。

4.武打场面的音乐伴奏，采用中路梆子的锣鼓经，如“四股头”“五锤子”“七锤子”等。

5.脸谱近似中路梆子，服装全部“小打扮”，不顶盔掇甲，如《翠云楼》点将一场，跑龙套的头戴娃娃们的虎头帽，身穿武士坎肩，手执旗牌就上了场，其他武将则身着紧身衣，手执各自的兵器上场。

温曲武秧歌原来只是贺家谋取功名的一种练武形式，他们规定武术不许外传。这种练武形式发展为别具风格的剧种后，也是温曲村独有，仍沿袭旧规，不去外地演出。因而，该剧种发展得十分缓慢。现在，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当地积极整理挖掘温曲武秧歌，已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豫让桥碑之初探

梁计元

读到12月10日《太原日报》第8版上的文章《志士愿凭一剑酬》，觉得有必要就“古豫让桥”石碑探究一番。

豫让祠坐落在太原市赤桥古村官道街与智伯渠交叉的西北处，祠门南墙中原嵌一石碑，上书“古豫让桥”四个大字，旁题“乾隆岁邑侯殷峰过此留题”，下接一首诗：“卧波虹影欲惊鸥，此地曾闻手搢仇。山雨往来时涨溜，岸花开落自春秋。智家宗已三分裂，国士愿凭一剑酬。返照石栏如有字，二心臣子莫经由。”落款为“同治六年岁次丁卯桂月中澣重镌”。

纵观此碑，有些疑点：

一是碑文上出现的时间不一致，即碑上书邑侯殷峰诗的时间是“乾隆岁”，而落款的时间则是“同治六年”，此碑到底是什么时候立的呢？

一是碑文上没有刘午阳的落款。按常规，写牌匾、楹联和碑文的书法家，大多会在文后落上自己的名字和时间。但是赤桥村人口传古豫让桥碑为刘午阳先生所书，可为什么刘午阳先生不在此碑上落自己的名字呢？

对上述疑点，有些拙见，供大家参考：

碑上落款中明确写到“同治六年岁次丁卯桂月中澣重镌”。这说明此碑不是原装品，而是重镌品。既然

是重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复制原碑文上的文字图样和内容，故刘午阳尽管书写了碑文上的“古豫让桥”等字，但都是按原字样复制的；另一种是重打锣鼓重唱戏，重镌刻此碑时，兴许原碑不复存在了，但从资料上还能找到原碑上的文字内容，故重由刘午阳先生另书写“古豫让桥”及碑文上的字。

“古豫让桥”石碑的历史起点至少应从清乾隆年间的邑侯殷峰在太原执政时算起。理由有两点：一是殷峰来豫让桥有感而发，写出“二心臣子莫经由”的诗篇；二是他完全具备条件而且也有可能，在豫让桥头立碑，并在上面刻上他的诗。

还有一种可能：在邑侯殷峰路过赤桥村豫让祠时，就已经有一块“古豫让桥”石碑立在豫让祠门前了。殷峰见碑有感而发，写下了诗篇。而到清同治六年（1867）重刻此碑时，由刘午阳先生把殷峰的诗也刻在碑上，彰显豫让义士精神。

至于“古豫让桥”碑文上的字是否为刘午阳先生手迹，笔者认为应为他所书。为何不署自己的名，大概也算先生自视清高、不图名利的又一事例；或许如前所言，只是复制摹写原碑的文字图样和内容，故不署名。



切成块的绿豆糕

绿豆糕，在汾阳又叫长寿糕。要说这绿豆，真是好东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绿豆“真济世之良谷也。……绿豆磨之为面，澄滤取粉，作饼炖糕，有解诸热、补益气、调五脏、安精神、厚肠胃之功。”因此当地人就琢磨出了这绿豆糕。老一辈人介绍，汾阳绿豆糕那时可与京津货相媲美。汾阳城内“天裕楼”李应堂老先生曾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掌柜兼糕点制作师，尤以绿豆糕制作见长。

制作绿豆糕包括选料、浸泡、清洗、推面、蒸面、和面、入模、分割、包装等工序。要做好糕，绿豆是关键，好的绿豆一定是颗粒饱满，色泽鲜艳。

挑选好绿豆后，用筛子过滤，倒入水中浸泡清洗。再煮制20分钟，至八成熟。然后捞出晾干，再放到石碾上推

晋之味

汾阳绿豆糕

周 彬

磨成面。手工作业需要慢节奏的耐心，需要时间发酵，只有充裕的时间，食材才会进行有效的化学反应，酝酿成熟，这应该才是其成品唇齿留香的关键。

碾好的绿豆面要彻底蒸熟，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其间要观察火候，这需要丰富的经验把控，面是否蒸到位，是绿豆糕成败的重要因素。

将蒸好的面倒在案几上，用铲子细细围成一个圆，中间凹陷，四周有围堰。再逐一将绵白糖、蜂蜜、糖桂花等堆放在面的中间。

材料要准备精致，制作则看经验与悟性。每一种用料都有自己的门道，不能马虎半点。虽然基本有定量，但外界温度、原料批次不同，都会影响到面的软硬以及糕点的味道与口感。

拎起一壶开水，缓缓倒下。瞬间，案几上如同打翻了调色板，绿色的画布，白色、黄色、酱色等在手工调和下，绚烂如花。

揉面要讲究刚柔相济，揉成松而不散为好。

随后将和好的面倒在一个木制的模具中。模具也为手

工制品，榫卯结构，方便拆卸。将面摊平压齐、压实，然后用刀将表面刮成粗湿状。均匀摊上约1厘米厚的绵白糖，再用力压实。

绿豆糕制作要一气呵成，利用温度将所有配料的营养与香气充分融合，这样才能达到口感与营养兼备。

绿豆糕这就算是做好了，稍冷却一会儿，拿起钢尺与钢刀，刀起刀落，一块块3厘米见方的绿豆糕应声而成。下面是绿茵茵的糕体，上面是一层均匀的白糖，香气四溢，让人垂涎。

最好吃的绿豆糕是刚制成的。拿一块放在嘴里，入口即化。再来一块，细细品味，却是淡淡相宜，入口味清，细嚼芳美，那清雅的豆香总是让人遐想万分。包装也很讲究。九块糕一层，三层为一方，四角折起，中间盖一大红商标纸。从绳轮上扯过纸绳，这边缠绕那边转，眼花缭乱之余，案几上的绿豆糕便码成了小山。好东西要有好包装，纸包装的感觉，不失原味还环保。

我对绿豆糕一直心有所念，是因为，一个地方对手艺和传统在执着地延续，那一定可以留住这方水土的故事。

安史之乱时，唐至德二年（757），唐肃宗趁叛军内讧，准备收复两京（长安、洛阳）。郭子仪认为河东地处长安、洛阳之间，从河东出兵占领潼关，就可切断两京叛军之间的联系，然后两京可图。当时，据守河东的是叛将崔乾佑。为了配合唐军行动，郭子仪派心腹秘密潜入蒲州城，联络陷于叛军中的唐朝官兵，届时里应外合。二月，郭子仪自洛交（今陕西富县）率军直奔河东，先攻取黄河西边的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二月十一夜，河东司户韩昱等翻越蒲州城墙迎接官军。郭子仪在韩昱等人的引导下，歼灭守城叛军近千人，迅速攻占蒲州城。崔乾佑率部东逃，郭子仪乘胜追击，歼灭叛军四千人，俘虏五千人。崔乾佑率残部逃往安邑城（今运城市区东北），安邑百姓诈降，叛军的队伍只进去一半，门闩突然落下，城内的百姓将入城的叛军全部歼灭。郭子仪收复了河东。

因为蒲州的战略地位对长安太重要了，三月廿三，叛军将领安守忠从长安率骑兵两万进攻蒲州，想解除蒲州的唐军对长安的威胁。郭子仪率兵击退叛军，杀叛军八千人，俘虏五千人。之后，郭子仪又派兵收复陝郡（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陝郡、潼关之间都在唐军的掌控之下。郭子仪以蒲州为大本营，不断地派遣部队从蒲州出发，渡河作战，向东、向西袭扰叛军，为收复两京做准备。九月廿八，唐军收复长安。十月十八，唐军收复洛阳。

在这次平叛战争中，黄河之滨的蒲州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战略地位。收复两京之后，朝廷更加认识到两京的安全与蒲州城息息相关。公元757年，朝廷在防务上进一步提升蒲州的地位，把河中防御使升为河中节度使，兼蒲关防御使，领蒲、晋、绛、隰、慈、虢、同七州，治所在蒲州。这样，就把河西的同州（辖7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河南的虢州（辖6县，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市）都划入蒲州的防区，加上河东地区的蒲州（辖8县）、晋州（辖9县，治所在今临汾市）、绛州（辖9县，治所在今新绛县）、隰州（辖6县，治所在今隰县）、慈州（辖5县，治所在今吉县），共计7州50县，这样兼有黄河东西、黄河南北的广阔防区，在唐代是很少见的，足见朝廷对蒲州的重视。当时，蒲州对首都长安的拱卫作用十分明显，朝廷对蒲州的防务特别重视，在出镇蒲州的将领人选上十分慎重。后来，朝廷多次派名将郭子仪等出镇蒲州，担任河中节度使。公元764年、765年，郭子仪数次从蒲州出兵，解除长安城的危险。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李怀光占据蒲州反叛，朝廷任命马燧为河东行营副元帅讨伐。马燧率兵先攻占绛州（今新绛县），收复龙门、稷山、闻喜、夏县、万泉、虞乡、永乐、猗氏等地。次年初进军至宝鼎（今万荣县西黄河岸边）。当时连年灾荒，长安刚收复不久，军需供应紧张，有不少大臣建议赦免李怀光，以尽快结束战争。马燧怕李怀光西逃，侵犯京城，也怕唐德宗对讨伐李怀光的部署有变动，就先回长安拜见皇帝。马燧坚决反对赦免李怀光：“怀光反复不可信。河中近畿，舍之屈威灵，无以示天下。”马燧对皇帝说：“臣虽不武，得当粮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于是朝廷部署大将浑瑊、镇国军节度骆元光、邠宁节度韩游瑰等配合马燧一起讨伐李怀光。马燧和浑瑊先在河西招降了李怀光的部下尉颺、徐庭光，然后率兵渡河，陈兵八万于蒲州城下。在平定李怀光的叛乱过程中，为了加强长安之东的防务，朝廷复置河中节度使，领河中府和同、绛、虢、陝四州，蒲州城的战略枢纽作用明显。公元785年农历八月，蒲州城中的叛军在朝廷大军的威慑之下投降。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的农民起义军进攻潼关，分兵一路进攻蒲州。驻守蒲州的河中节度使李都未做抵抗，投降了起义军。因为黄巢在长安不断派人向蒲州加征钱粮，当地不堪重负，李都的副将王重荣杀了黄巢派来的使者。黄巢派遣同州（同州与蒲州一河之隔）的朱温、华阴的黄郛出兵进攻蒲州，王重荣大败朱温和黄郛的军队，缴获粮食等军需物资40余船。王重荣在蒲州大败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是黄巢在长安称帝后遭受到的第一次大败仗，唐王朝的军队开始进行反击。次年五月，朝廷任命王重荣接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从蒲州出兵，一度占领华州（今陕西省华县）。这也说明了驻守蒲州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迎战还是出击，都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由于王重荣据守蒲州，连败起义军，给唐王朝赢得了部署军队围攻起义军的时间，当时黄巢的号令“不出同、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农历正月，朱温渡河进攻蒲州，又被王重荣击败。九月，连吃败仗，驻守同州的朱温向驻守蒲州的王重荣投降，唐军收复了同州。不久，驻守华州的起义军将领也效仿朱温，向王重荣投降。唐军不战而收复同州、华州两处战略要地，立刻扭转了关中地区的军事局面，唐军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十二月，李克用的四万沙陀军从太原到达蒲州，随后过黄河，进驻同州。公元883年农历二月，李克用的军队和王重荣的部下向黄巢的起义军发起进攻。四月，黄巢出逃，唐军收复了长安。唐军的总指挥杨复光在给皇帝的报捷奏折中，赞扬蒲州的王重荣：“誓立功名，志安家国。至于屯田待敌，率士当冲，收百姓十万余家，降贼党三万余人。……自收同、华，进逼京师，夕烽高照于国门，游骑频临于灞岸。”在这几个月收复长安的战役中，唐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蒲州城，军需物资也从河东地区供应，蒲州又一次在危急时刻发挥了对长安城的拱卫作用。公元885年，朝廷赐河中军号为“护国”，驻防蒲州的军队被称为“护国军”。

黄河战事

唐中后期蒲州之战

李广洁